

「外交史青年學者研究群」的成長與蛻變

許峰源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因中國大陸情勢劇變，撤守臺灣，情勢岌岌可危。隨即因韓戰爆發，受惠美援鼎助，轉將危機化為轉機。1950-1971 年間，兩岸軍事對峙，屢發衝突，在國際上彼此為競逐中國代表權、追求大國國際地位，處處針鋒相對。其間中華民國尚能在以美國為首的民主集團保護傘下，穩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之席位，參與以聯合國為核心所開展的國際事務。1971 年中華民國因國際有利形勢急轉直下，率而退出聯合國及週邊組織，自此之後在國際的地位一落千丈。當年編號第 2758 號決議案，如同一把巨斧砍斷中華民國與聯合國體系的各項合作關係，更嚴重地劈斷我與諸多盟邦情誼。四十多年來，中華民國對外關係屢遭瓶頸，時時得被迫面對邦交國突如其來的斷交窘境，在國際上亦得處處提防中華人民共和國無預警式的打壓。今日中華民國雖然居於惡劣處境，政府依舊正視外交之發展，縱使國際氛圍不利於我，仍試圖透過務實手腕、靈活精神探求活路，為外交窮途另闢蹊徑。

汲取歷史經驗以為借鑒，早已老生常談。惟當前正值政府推展活路外交、探尋國際地位新契機之際，國內研究中華民國外交史專家、大專院校開授中國外交史課程卻出現劇烈的斷層。早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出版一批清末民初《外交檔案》，研究員們更以檔案為研究基礎，樹立南港學派，獨樹一格。這股學術風氣，也吸

引全臺大學師生們投入外交史行列，盛況空前。近十幾年來，臺灣學術風氣愈趨開放，尤其 1950-1980 年代《外交檔案》相繼解密、開放，以及進行數位化作業，臺北實已成為全球鑽研中國外交史的寶庫。歐美、日本與中國大陸學界更是爭相前來查閱《外交檔案》，已將研究的觸角伸入其中。反觀在臺灣的年輕學子們多受到本土化潮流的影響，以及新文化史的薰陶，多半投身於臺灣史與社會史等研究領域，鮮少願意再埋首於枯燥的《外交檔案》中，遑論耙梳乏味官方文書進行外交史研究。

長遠來看，歐美、日本與中國大陸廣續培育鑽研中國外交史新血輪，蓄積學術能量，厚實學術潛力，尤其在檔案的基礎上，從更多元的視角詮釋中國外交史，實為臺灣學界必須正視的問題。2010 年 2 月在臺灣一群熱衷中華民國外交史的年輕學子們，（註1）與歐美、日本與中國大陸學界數次交流後，油然興起一股危機意識，決定組成「中華民國外交史研究群」，藉以號召有志於該領域的研究同好，共同打造臺灣新一代外交史研究品牌。萬事起首難，成員之一的王文隆先生多方奔走後，研究群終於有了雛形。研究群成軍後幾經磨合、凝聚共識，決定每年投入一個主題的討論，並且藉由每個月定期聚會、提報研究計畫、撰寫專題論文，再舉辦研討會，邀請專家指導。最終的目標，則是尋求機會，將論文交付審查，出版專書。

人生有夢，築夢踏實。當年一群年輕學子遙不可及的夢想，歷經一番付出努力，而得以開花結果。2011 年 1 月 27 日，幸賴政大人文中心伸援慨借場地，使得「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青年學者的探討」討論會能夠順利舉行。該次討論會，總共邀集 30 餘位國內外的外交史專家、國際關係史學者參與活動，討論熱烈。第一屆討論會之後，不少與會師長們都給予正面鼓勵，希望研究群能夠繼續前進。而最令人振奮的，則是許多外交史同好參與會議後，紛紛表示加入團隊，共同努力。鑒於新加入的成員中，有專攻於晚清外交史研究者，（註2）因此中華民國外交史研究群遂易名為「外交史青年學者研究群」。

有了好的開始，研究群更須加油。自 2011 年 3 月起，研究群開始第二年運作，鑒於第一屆討論會中儘管有諸多學者肯定每篇論文品質，然質疑整體討論主軸不夠明顯，這些論文如同每位作者監守本身專業的論文報告，未能聚焦。此一不足之處，成為研究群首要克服的障礙。幾經激盪後，成員決定在彼此擅長熟悉的《外交檔案》基礎上，添入國際法元素，作為討論主軸。接續的近一年時間裡，成員們且戰且走，一邊摸索國際法論理、交換心得，一邊提交計畫、撰寫專文。至 2012 年 2 月 3 日，研究群在政大人文中心、中國近代史學會協助下，在政大行政大樓召開「國際法的詮釋與運用討論會」，吸引 40 餘名歷史學專家、國際關

係學者蒞會指導。由此足見，此次會議匯流歷史學與國際法的研究，引起不少與會者共鳴，會中討論甚為熱絡。

第二屆討論會結束後，研究群立即於2012年3月聚會，商討第三年進行的形式。大抵上有了前兩年的運作經驗，以及兩次研討會的基礎，決定以國際秩序與中國外交變動為是年的討論主題。至2013年2月1日，歷經近一年努力後，「國際秩序與中國外交的形塑」再度於政大行政大樓召開。這次會議未見先前鑽研國際法學者們與會，反倒吸引國內研究國際政治、世界秩序的專家與年輕學子們共襄盛舉。當日的會議主要分為3個場次，共9篇論文發表，以及1場座談會，分述如下。

第1場「中國與國際秩序的交融」。呂慎華，〈庚辛之際中國重回國際社會的努力——以兩宮回鑾問題為核心的討論〉，考察晚清遭逢庚子亂事，國內政治秩序因外力影響，造成兩宮西狩之局。其間，中國外交官不斷與列強斡旋、交涉，兩宮得以回鑾穩定國內局勢，隨之展開對外新局。蔡振豐〈文明秩序之參與——中國設立俘虜收容所之探析（1914-1920）〉，討論一戰期間與戰後，中國北京政府模擬西方文明國處理俘虜之手法，在境內開設多處俘虜收容所，進行戰俘之處置，藉以彰顯文明國、戰勝國地位。應俊豪〈亟思反制：1920年代後期英國政府處理廣東海盜問題的決策轉向〉，從國際關係視野觀察中國海盜問題，剖析英

國在華遭逢五卅事件、省港罷工運動等事件後，對中國海盜方針從原與廣州合作的溫和政策，轉為英軍片面自行圍剿之變局。這3篇論文，主要關注二十世紀前後中國外交問題，雖然各篇論旨不一，然核心關懷都緊扣著中國在國、內外秩序變動之下的應對進退，以此進行討論。

第2場「戰爭、衝突與國際秩序」。王文隆〈中東路事件期間國民政府尋求國際調解的嘗試〉，探查1929年中蘇因中東路引發戰端，當時國民政府欲以國際利我之《非戰公約》、《國聯盟約》，引介英美勢力調解，這實為1930年代中國將中日爭端提請國際仲裁的先聲。自1931年起中日陷入所謂的十五年戰爭狀態，兩國關係愈趨緊張。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東亞國際秩序因日本戰敗，而有所變化。張志雲〈轉嫁歷史共業：戰後中國海關的關員審查〉，觀察戰爭期間淪陷區中國外籍海關人員之身份認同爭議，予以梳理。最終，討論海關高層召開海關關員審查會，以認同外籍海關人員的表現，轉嫁其歷史功業。楊子震，〈戰後東亞秩序與中華民國對琉球群島政策——以在臺琉僑的政治運動〉，分析1950年中華民國撤退臺灣以後，對於琉球歸屬態度，以及處理在臺僑在臺灣的政治舉動，實源於當時反共復國的基本策略，以及順應美國在遠東的布局所致。仔細觀察，這3篇論文表面上處理1920-1950年代中國外交議題，然實際上更將焦點伸入戰爭致使國

際秩序變動，以及中國對於變局的反應。

第3場「冷戰與國際秩序的變動」。自1950年起中華民國因應臺海分裂、兩岸局勢丕變，在國際上力爭參與聯合國及其週邊組織，以穩固中國代表權，也因韓戰的爆發，涉入美蘇冷戰的框架之下。蕭道中〈1950年中共向聯合國控訴美國侵略臺灣案研究〉，討論1950年6月韓戰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中立臺海，引發中共向聯合國安理會、秘書處控訴美國侵略臺灣案之緣由與發展。任天豪，〈第三清德丸事件與冷戰中的東亞秩序——兼論釣魚台問題的一個遠因〉，從《外交檔案》發現該事件珍貴紀錄，佐以相關史料撰文討論，尤能連結當前眾所矚目的釣魚臺主權歸屬爭議，提供另一思考角度。許峰源〈世界衛生組織與中國代表權爭議始末（1950-1972）〉，梳理1950年代初期中華民國退出、再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歷程，進而關注臺海兩岸在世界衛生組織隨之而起的中國代表權角力戰，以及1972年中華民國在國境之下被迫離開世界衛生組織。

最後，綜合座談中，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副教授川島真、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石之瑜，以及東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唐啟華3位主講人，以及與會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力、張啟雄、林泉忠，東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吳翎君、許育銘，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李福鐘以及歷史系助理教授廖敏淑等專家學者們，分別從

各自擅長的中外關係史、國際關係史、國際政治史的視角，抒發對於「國際秩序與中國外交的形塑」討論會的觀察，並惠予諸多寶貴意見，供作研究群參考。

當初研究群成軍之最終目的乃是爭取支持，出版會議成果。目前政大人文中心已著手第3次會議「國際秩序與中國外交的形塑」論文審查作業，預計年底付梓。現在回想2011年春第1屆會議結束時，研究群遭遇的困境之一，便是尋找出版管道。猶記得縱使多方接洽，始終是碰壁收場。幸賴政大文學院周惠民院長與人文中心施予協助，讓各篇論文提交學者匿名審查、修改後，於2012年5月集結出版《多元視野下的中華民國外交》。（註3）這本專書耗時一年又半載後，終得以出版，對研究群之意義頗為深遠。該書按照時序共有六篇。第一篇是應俊豪〈1920年代列強對華砲艦外交的分析研究〉，重新整理其長久累積的個案研究，予以淬鍊，提出1920年代列強在華施行砲艦外交之運作模式。第二篇是陳群元〈1933年中國關稅稅率調整問題之中日初期交涉〉，探索1930年代中日兩國走向戰爭的過程中，歷來研究都著眼雙方軍事對壘、意識分歧，劍拔弩張。該文則另闢蹊徑，從攸關經濟利益的關稅稅率交涉上，進行深度討論。其他依次為王文隆〈重慶國民政府與戴高樂政權的雙邊關係（1941-1943）〉，梳理抗戰後期兩個中國與兩個法國的特殊關係，發現重慶國民政府與維琪法國雙方也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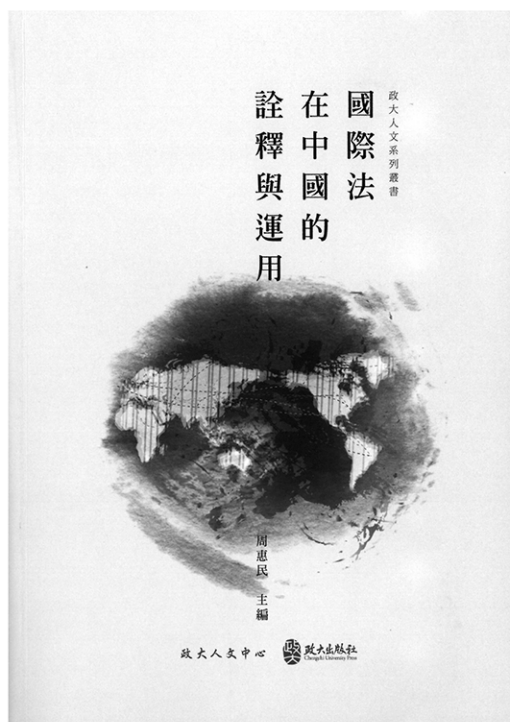


《多元視野下的中華民國外交》封面
(圖片提供：政大出版社)

以宣戰而決裂，這些微妙關係實值再繼續研究。徐宏馨〈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的日華關係：關於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的成立〉，注意到 1950 年代臺日官式外交之外，亦另闢第二渠道，成立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該委員會是為雙方高層組織的民間管道，協商範疇涵括政治、經濟與文化事務之聯繫，扮演重要角色。任天豪〈光華寮事件與中華民國政府的冷戰「知覺」(1956-1966)〉，將

光華寮此一傳統的國際法重視的事件，注入歷史研究，並且引用新的文化史元素，融入文化研究、意識與知覺等新的角度，賦予解釋。許峰源，〈臺灣對亞洲副霍亂的肆應(1961-1964)〉，考察 1960 年代亞洲副霍亂襲擊臺灣，重挫農產品外銷貿易。中華民國強化防疫、杜絕霍源，並透過對日外交重啟貿易，化解危機。這六大部分，如外界指教般未能聚焦在同一主題上，卻都能夠對以往中華民國外交史鮮少被注意面向，特別梳理討論，展示不同觀察視野，實為《多元視野下的中華民國》一書的貢獻。

2012 年中旬，研究群承蒙政大人文中心厚愛，納為教育部頂尖大學計畫項下，由許倬雲院士主持的「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計畫」之一研究子題，逼使研究群成員得更努力，以不辜厚望。2012 年底第 2 本專書《國際法在中國的詮釋與運用》，歷經政大人文中心主持的審查作業，以及獲得政大出版社主編劉維開教授鼎助，得以出版。(註4) 這本專書，總共有 6 篇專文。應俊豪〈1920 年代前期長江航行問題與中外爭執〉，以列強在華利益之長的長江流域為場域，觀察中國內部戰爭，牽引出列強援引國際法試圖解決問題，為外交史研究著入國際法元素。王文隆〈圍繞滿洲國成立的幾個國際法問題及影響〉，在以往學界關切九一八事變後中日問題的處尚，進一步考察中國透過國際法規範，在國際社會控訴日本背離《國際聯盟盟約》、《九國公約》，逼



《國際法在中國的詮釋與運用》封面
(圖片提供／政大出版社)

使日本與國際公理漸行漸遠。蔡振豐〈中國收管德奧使館衛隊及軍械之研究（1917-1922）〉，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宣戰為觀察點，討論中國因循用西方國際法原理接收德奧軍械，引發中荷糾紛、衝突。最終，中國透過外交途徑與荷蘭斡旋，解決爭議。張志雲〈分裂的中國與統一的海關：梅樂和和汪精衛政府（1940-1941）〉，從汪精衛政權之國際合法性與實際財政考量為觀察要

點，檢視汪政權如何與海關稅務司之運作磨合，提出多元解釋。蕭道中〈聯合國戰罪審查委員會與中國戰罪政策的發展（1942-1945）〉，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中國政府參與國際有關戰罪資料之蒐集後，漸從東方觀念去認識西方國際法戰罪理念，並表現於之後對日的政策上。任天豪〈「正統」與「生存」的糾葛：中華民國對中共核武的外交因應（1960-1968）〉，討論 1964 年中共建立核武後，立刻改善其國際地位，直接衝擊中華民國的國際形勢。這些議題，雖然看似互不相屬，卻難能可貴的共同圍繞國際法主軸進行論述，足證明研究群實已往前跨越一大步。

自 2013 年 2 月起，研究群又有新血輪的加入，（註 5）將共同參與第三年「國際衝突與中國外交的競逐」主題的討論，希冀不久後能夠提交研究成果，汲取學者專家們的寶貴意見。至 2015 年初，研究群屆時成軍已有五年，除了將對預擬的「國際強權與中國外交的肆應」主題進行專文討論外，也將規劃每位成員總結幾年來的研究心得，甚至能夠對中國外交史予以詮釋。最終，本研究群希望能夠扮演拋磚引玉的角色，藉此喚起學界對於中國外交史研究的重視，也竭誠歡迎對此領域有興趣的同好們，一同加入我們參與討論，建構一個綿密互動的外交史研究網絡。

【註釋】

1. 當時成員有王文隆（當時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現為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主任）、任天豪（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徐滋馨（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許峰源（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陳群元（浙江大學歷史系講師）、黃文德（國家圖書館編輯）、蕭道中（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應俊豪（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戴振豐（臺北教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等。
2. 新成員有呂慎華（國立中央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張志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

後研究）、楊帆逸（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楊子震（日本筑波大學兼任研究員）、蔡振豐（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蕭李居（國史館助修）。

3.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編，《多元視野下的中華民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12年）。
4. 周惠民主編，《國際法在中國的詮釋與運用》（臺北：政大出版社，2012年）。
5. 新成員為：尤淑君（浙江大學歷史系講師）、侯彥伯（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生）、林亨芬（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國史館人物系列專題演講

詳細資訊請至國史館網頁（<http://www.dnrh.gov.tw/>）查詢